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发展历程、政策实践及启示

李帮喜 姜力榕

摘要：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悠久。自19世纪末至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从萌芽、繁荣、萧条到复兴的发展阶段，先后涌现出一批知名学者，尤以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代表的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国际影响广泛。二战后，相关学者们将研究成果积极应用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促进日本经济复苏和迅速腾飞；21世纪以来，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批判与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下“失去的二十年”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重振日本经济的举措。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中的成果与困境，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双重借鉴意义。

关键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 “失去的二十年”

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代表性理论成果

（一）发展历程：萌芽、繁荣、萧条到复兴

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接受西方社会的文明思想，社会主义思潮也随之于19世纪末传入。1893年，东京民友社编辑出版了《现代社会主义》，其中提及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杨立国、田晓萌，2022）。1899年，福井准造在《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资本论》中有关资本的性质和来源、价值理论、唯物史观等方面的内容。随后的二十年间，

[作者简介] 李帮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邮政编码：100084，电子信箱：libangxi2013@foxmail.com；姜力榕（通讯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邮政编码：100084，电子信箱：jlr22@mails.tsinghua.edu.cn。

《资本论》全三卷的日文版相继出版，引起了日本学界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关注（商紫君，2021）。其中，河上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先驱，也是日本首位认真且系统地研究《资本论》的学者，著有《唯物史观研究》《资本论入门》等。20世纪20年代，河上肇从社会改良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在京都大学任教期间教授“经济学原论”课程，讲稿内容便是基于他自己对《资本论》的解说（河上肇，1963），涵盖了资本的生产、变形、流通过程等基本原理。^①在河上肇之后，他的学生宫川实继续《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和普及工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日本工人中的传播和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著有《资本论研究》一书。宫川实曾于1962年赴中国访问交流，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了关于《资本论》研究的学术报告，介绍了日本在不同历史阶段重点研究的问题和《资本论》一书运用的方法论。^②此后，日本《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持续至今。据统计，自《资本论》引入日本以来，共有7种全译本，最新版是2019—2021年由日本共产党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的《资本论》（全12册），足见其在当下的日本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以《资本论》在日本的引进、翻译和传播为伊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跨越百年，历史悠久。

在一战到二战期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强调从整体性出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横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并未细分出专业研究领域（谭晓军，2014：39—44）。因此，这一阶段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尚处于萌芽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关于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和日本资本主义的三次学术论战（张忠任，2005）。例如，20世纪30年代，围绕《资本论》的研究出现了讲座派和劳农派两大学派，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山川均、河上肇等学者在论战中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分析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涉及了地租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等（杨立国、田晓萌，2022）。这些激烈的思想交锋体现了学界对马克思学说中经济思想的关注，为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后，由于天皇制转变为“象征天皇制”，以及日本共产党合法地

① 相关论述请参见河上肇文库讲义ノ一卜・原稿・手稿類，<https://www.econ.kyoto-u.ac.jp/~chousa/collection.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6月5日。

② 参见《经济学动态》编辑部（1962）。

位的恢复，在战争期间遭受迫害的学者得以回归学术，马克思主义研究拥有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开始走向繁荣发展阶段。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组成了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另外一些相对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以《季刊理论》杂志为平台展开研究，被称为“季刊理论派”（谭晓军，2014：39—44）。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术界出现专业化倾向，马克思主义者们依靠所属的专业学会逐步进入细分领域，由此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推向高潮。仅仅围绕《资本论》的研究，就出现了正统学派、宇野学派、数理学派和调节学派的“百家争鸣”现象，其中数理学派的观点甚至在国际上引发了欧美经济学家的关注与讨论，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树立了国际声誉（杨立国、田晓萌，2022）。在学术创新的基础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还将理论成果付诸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实践。他们通过在政府任职、提供决策咨询等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推行刺激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发展的产业政策，建立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劳资关系和企业管理模式，在促进经济恢复、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程恩富，2004；张季风，2018）。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开始由盛转衰。一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国际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陷入低谷，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进一步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另一方面，以撒切尔和里根政府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使得日本政府的基本经济立场向私有化、自由化等方向转变，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在此期间，很多日本的大学不再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业课程，研究人员被迫转岗，给相关学术活动带来沉重打击（杨立国、田晓萌，2022）。但是，仍有以伊藤诚为首的学者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获得启发，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反攻：政治经济学的复活》《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等一系列著作，艰难坚守着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阵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谭晓军，2011）。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展，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并通过国际贸易等手段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探讨又推向了一次新热潮，被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内田弘称为一次“总体性复兴”。据阎瑞雪（2021）的统计，2008年之后日本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方面的论文、期刊和著作数量较之十年前显著上升，重点关注剩余价值、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贫富差距等问题。关于经济危机的成因，正统学派、宇野学派和调节学派分别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信用和金融体系的恐慌、从“福特主义”向“金融主导型模式”转换的视角予以解释（渡边雅男、谭晓军，2016）。其中，太田仁樹（2012）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比鲁道夫·希尔弗丁（Rudolf Hilferding）^①的金融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宇野弘藏的三阶段论，并进行批判性的评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本身便蕴含了危机。针对日本国内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固化等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们通过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反思其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的缺陷，探讨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吕守军，2010）。在以福岛核灾害为代表的生态环境危机发生后，部分学者又从制度视角加深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批判，促进了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乔洪武、陶芸，2016）。

总体来看，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无论是与当前日本国内主流经济学的声量相比，还是与20世纪70年代其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都依旧式微。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窥见其背后的部分原因：一是学科整体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下降，历史上数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方法创新为该学派赢得了国际声誉，而当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则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二是政府导向问题，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金融危机等问题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却在经济政策实践上受限；三是学术层面的弱化，由于经费削减、招生限制、教师岗位缩减等问题，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缺乏后继人才。可以说，日本的前车之鉴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反面教训，敲响了警钟。

（二）理论成果：以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代表

当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较为丰富，包括正统学派、宇野学派、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市民社会派和调节学派等（程恩富，2004）。其中，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借鉴数学工具和定量分析技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

① 学界多译为鲁道夫·希法亭。

经济学的数理化及其在现实经济问题中的运用。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创性贡献,具有极强的理论创新性。在历史上,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曾在20世纪70年代于国际理论界引起过广泛讨论,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因此,本部分对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的发展脉络作出简要梳理。

20世纪30年代,京都大学的柴田敬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化的先驱。柴田敬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典框架“一般均衡体系”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江永基,2010),并于1934年在《京都大学经济评论》发表《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一文,提出置盐定理(Okishio's Theorem)的雏形(Shibata,1934)。

二战之后,日本学者一方面受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瓦西里·涅姆钦诺夫(Vasili Nemchinov)、列昂尼德·坎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和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等人的影响,开始关注经济数学方法,求解线性规划问题;另一方面为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开始接受边际主义学派的分析工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越村信三郎,他认为数学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手段,既适用于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可适用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江永基,2010)。因此,越村信三郎分别于1956年、1967年和1968年出版了《再生产论》《危机与波动的理论》《矩阵簿记:原理与运用》三部著作,实现了矩阵理论和其中的簿记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良好结合,将数学方法正式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世纪60年代后,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继承了前人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数理化思路,并积极在英文刊物上撰文,从而将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际上发扬光大。置盐信雄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且严谨的数学分析,提出了“给定实际工资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基本品行业引入的技术创新满足成本准则,新均衡中的一般利润率将提高”的置盐定理(Okishio,1961)。仅从结论来看,置盐定理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存在分歧,因此引起了欧美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讨论,也受到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骆桢,2010;李帮喜、王生升、裴宏,2016;骆桢,2017;王生升、李帮喜、顾珊,2019)。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文章批判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转形分析，引发了国际上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森岛通夫以捍卫转形问题的立场与批判派的萨缪尔森展开论战，他运用佩龙-弗罗宾尼斯定理和马尔可夫过程，使用迭代法求解了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转形问题。此后，森岛通夫又于1973年出版《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一书，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形过程予以批判性分析，并提出了“森岛定理”。在这场围绕价值转形的论战中，森岛通夫和萨缪尔森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进一步扩大了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谭晓军，2011）。除了上述两位蜚声国际的大师外，前日本经济学会会长二阶堂副包、置盐信雄的弟子中谷武、早稻田大学教授藤森赖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林直道等经济学家均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研究的杰出人物。

21世纪以来，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方面，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对剥削理论、置盐定理、转形问题等经典问题的研究，如守健二、吉原直毅等；另一方面重点关注马克思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如大西广、田添笃史、山下裕步等。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方面，学者更多关注金融化、收入分配和生态环境问题（冯志轩、陈伟凯、李帮喜，2018；陈伟凯、冯志轩、高晨曦、李帮喜，2019；阎瑞雪，2021）。

作为历史上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学派，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优秀成果对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日本的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前提下，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工具展开定量分析，有利于加强不同流派的交流。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话语体系、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本质区别，但数学语言具有的普遍性和科学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好地对话，增进不同理论的理解，促进经济学理论整体的发展。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引入数学工具后，尝试对过去《资本论》中无法解决的转形问题等重大理论问题予以回应，提供了解释此类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除了将数学工具应用于理论模型的搭建之外，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还积极使用定量分析工具展开经验研究。例如，基于矩阵运算原理，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等实际问题，指导现实的经济社会实践。

在当今中国，也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致力于数理化方向的研究，以数理化作为学理化的手段，将理论成果与中国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有助于加强国际交流，向世界更好地传递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

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策指导与实践

（一）对二战后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贡献

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和西欧各国进入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先用1945—1955年的十年时间实现了经济复苏，而后1956—1972年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3%的高速增长，^①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

日本的战后经济复苏除了受到朝鲜战争“特需景气”、美国援助贷款等外部影响，还与日本国内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相较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突出不同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二战后，日本政府通过经济计划、产业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抑制经济步入周期性衰退。尤其是日本的产业政策：重点扶持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行业和部门，如20世纪50—70年代的钢铁、汽车、造船等重工业和20世纪70—8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同时抑制纺织等部分传统产业的比重。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直接服务于赶超目标与战略，成为日本战后复兴和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战后的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第一本经济白皮书《1947年经济实况报告》的主要起草者、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都留重人早年深受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进入哈佛大学求学后，他致力于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二战后的日本经济重建时期，他曾在经济安定本部任职，直接参与了日本战后尤其是美占时期的经济改革。针对日

^① 数据来源：内閣府ホーム・内閣府の政策・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https://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7月22日。

本当时的经济严重困难，都留重人运用统计资料证明日本正处于缩小再生产阶段——面临财政赤字、物资短缺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等问题。针对此，都留重人提出八项紧急对策：确保粮食；确保生活配给；稳定物价和工资；实施完成3000万吨煤炭生产政策；健全财政，重点放贷；劳动就业对策；振兴出口贸易；扩大以合作社组织形式为目标的中小企业对策（朱绍文，1981）。在《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一书中，都留重人（2020：273、279）将日本战后独特的经济模式总结为“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的混合经济”，其实质是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混合。

同样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有泽广巳在1946年发表的论文《不可避免的事情》中指出，面对生产停滞问题，日本应将过剩的劳动力和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煤炭和钢铁等基础原料部门，从而启动全体产业的扩大再生产。在1946年8月经济安定本部举行的例会上，有泽广巳以“倾斜生产方式”的名义正式提出这一生产政策，并被时任首相吉田茂采纳。吉田内阁随后制定了煤炭的年度生产计划，对煤炭和钢铁产业优先放贷，并提供价格补贴；吉田茂下台后的片山内阁也继续沿用了这一生产政策，直到1949年才被美国政府援助的“道奇计划”所取代（王新生，2019）。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制定部门生产计划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倾斜生产方式”的生产政策注重产业结构和部门比例的引导与调整，劳动力等资源配置的主要目的则是服务于扩大再生产，这些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理论与思想。

除了上述两位直接参与战后经济政策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外，还有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学者担任政府委员会的专业顾问，为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例如东京大学的教授大内兵卫，作为财政学领域的专家，他在赴欧洲留学后，开始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财政学研究。在战后，大内兵卫曾担任内阁统计委员会委员长，与学者们共同商讨如何重建日本经济，整顿国家的经济统计工作，控制因战争赔付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后期还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除了经济学家外，在农业等专业领域，也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参与了经济改革。例如东京大学教授、农学博士东畑精一，他受到马克思著作的影响，致力于农业经济的研究。战后东畑精一虽然拒绝加入吉田内阁，但担任了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所长，并成为日本《农业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此外还有同为东京大学教授、

农学博士的近藤康男，他在研读《资本论》的过程中大受启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剖析日本农业经济问题的有力武器，于是从改良主义者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战后，近藤康男曾加入大内兵卫领导的内阁统计委员会，担任农林省统计调查局局长，探索日本农林统计制度的建立（李公绰，1986）。

总结来看，二战之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任职政府部门和担任决策顾问的方式，积极参与战后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使得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色，并未完全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同时还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色彩。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柴垣和夫认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二战后表现出诸多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蕴含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高晨曦，2019）。这些政策也被证明极大地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突出成果。

（二）对“失去的二十年”的批判与反思

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得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陷入“滞胀”问题。受此影响，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物价暴涨和供给不足的现象，经济增速由1972年的9.1%下降到1973年的5.1%，到1974年甚至出现了-0.5%的负增长。此后的十几年间，日本经济在波动中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推出扩大公共投资等政策刺激经济回升，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削减财政支出造成衰退，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技术发展和对美出口促进经济繁荣，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造成“日元升值萧条”，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资产价格飞涨的泡沫经济阶段（张季风，2018）。1974—199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4.2%，仍属于稳定增长阶段。但是，自1991年起，日本的股票和地产泡沫破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90年的6.2%骤降至2.3%，成为日本经济步入慢性衰退的转折点，直至今日仍未再出现4%以上的增长率。^①

21世纪初，日本社会普遍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停滞称为“失去的十年”；2009年，池田信夫提出了“失去的二十年”的命题，^②得到了学界

^① 数据来源：内閣府ホーム・内閣府の政策・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https://www.esri.cao.go.jp/jp/sna/menu.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7月23日。

^② 参见日本学者池田信夫的作品《失去的二十年》（池田信夫，2022），日文原作为『希望を捨てる勇氣—停滞と成長の経済学』。

的广泛关注；而近年来，日本又出现了“失去的三十年”的声音。^①作为地理位置近邻、文化源头相似的东亚经济体，日本的长期经济停滞对中国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在我国，有学者就日本“失去的十年”与“失去的二十年”是否真的发生、日本长期衰退背后的成因、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教训与启示、日本与我国经济对比等话题展开研究（王焱侠，2010；梁颖、陈佳鹏，2013；张季风，2013；余飞、黄瑞玲，2018；闫坤、汪川，2022）。在日本，关于经济长期停滞背后的成因则存在更为广泛的讨论。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2021）认为，日本经济由盛转衰是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的后遗症。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出现贸易摩擦，美国强制日本缩小贸易逆差，日本政府遂采取降低利率、增加财政支出等政策，满足美国需要。低利率伴随着《广场协议》签订后的日元升值等经济刺激措施导致日本国内出现通货膨胀，证券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投资过热，价格飞升，最终政府不得不出台政策刺破泡沫，由此开启了日本的长期经济衰退。

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普遍认为，日美贸易摩擦引起的资产泡沫破裂只是外部导火索，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日本的推行才是造成“失去的二十年”的根源（张杨，2023）。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在滞胀危机中失效，使其丧失了在经济理论界的主流话语权，新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抬头，日本经济政策的基本立场也随之发生了转向。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指出，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行政改革的形式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日本的社会秩序以公司为中心”，经济急剧恶化，社会层面的不平等加剧（伊藤诚、丁晓钦，2005）。具体而言，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特点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资本扩张无序化、劳工保障被弱化、社保领域自由化。（1）国有企业私有化。1981年，日本内阁的行政调查部成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提出“中央与地方行政的合理化与效率化”等三项紧急课题。1982年，出于缩减财政赤字、提升运营效率的目的，正式确立了日本国有铁道公司、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和日本烟盐专卖公司民营化改革的方案（刘迪瑞，2016）。1987

① 参见日本经济学家、前大藏省官员野口悠纪雄的作品《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野口悠纪雄，2022），日文原作为『平成はなぜ失敗したのか（「失われた30年」の分析）』。

年，三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全部完成，被认为是日本私有化改革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 资本扩张无序化。新自由主义的宗旨是竞争性市场的效率最大化，因此日本政府为企业的贸易、投融资和跨国经营行为提供积极的政策支持，降低法人税和企业所得税率，鼓励企业借助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系统雇用廉价的非全职工人，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张，导致日本国内生产规模缩小、资本外流，出现大量的劳动力海外转移（高田太久吉，2013）。(3) 劳工保障被弱化。日本政府一方面放松劳工保护法，打破终身雇佣制，缩短长期雇佣关系年限，导致小时工、临时工、劳动派遣等非正式就业者迅速增加。2015年，日本的非正式就业者占比达到了37.5%，尤其女性劳动者中近60%为非正式就业。另一方面削弱工会力量，就业工人的组织率由1970年的35.4%下降到2003年的19.6%，再下降到2015年的17.4%，劳动者相对企业的谈判能力大幅下降，劳工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伊藤诚，2017：11—12，15）。(4) 社保领域自由化。受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日本的社会保障服务愈发与个人财产收入挂钩，强调“个人责任”。例如医疗领域中不参保的医疗项目逐渐增多，医疗服务的个人承担比例在2003年达到了30%（伊藤诚、丁晓钦，2005）。这极大地加重了低收入阶层的负担，使得只有部分高收入人群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造成社会不公平。总结来看，在日本政府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国民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占比下降，国家干预减弱；劳资对比中的资本力量增强，劳工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就业的不稳定性以及非正式就业者的不平等待遇，造成劳动者工资水平和消费能力降低，内需不振；社会保障领域的自由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进一步加剧社会风险。

除了新自由主义思潮这一被普遍认识到的影响外，柴垣和夫（2014）更进一步指出，日本的经济刺激政策并非仅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是受到凯恩斯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混合影响。历史上，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失灵”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失灵”曾在日本交替出现，而当前的日本则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现实：一方面通过财政注入等紧急经济对策加强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又执着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安倍经济学”。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1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安倍内阁混合使用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刺激政策。一方面，同时实施“大胆的金融政策”（2%的通货膨胀目标、无限制的量化宽松、纠正日元

升值等)、灵活的财政政策(10万亿日元规模的财政预算、国土强韧化计划等)和激励民间投资(放宽管制等)的“三支箭”方针。这一方针显然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小泉内阁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与美国一起积极谋求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放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限制,加强自由化。但是,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并未能改变日本反复出现泡沫崩溃、经济增长率低位稳定运行、利润率周期性不确定的经济波动局面,其深层原因在于这些政策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历史上,资本主义为避免基本矛盾爆发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只有以凯恩斯主义为支撑的财政金融政策组合,因此当凯恩斯主义因“滞胀”崩溃之后,只能回归新自由主义。日本经济政策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交替切换乃至混合使用,只是印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危机,而没有为解决问题开出新的处方。

伊藤诚和柴垣和夫的观点从宏观上指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日本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在更细分的专业领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对“失去的二十年”进行了细致分析。例如,松本朗(2017)聚焦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指出日本的经济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非传统金融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为代表的流经济学家断言日本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需要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于是自1999年以来,日本央行严格遵循这一道路,实施“非传统金融政策”,明确了3%—4%的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实行负利率并大量印发货币,但政策效果却并不理想。松本朗(2017)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货币商品的功能、过剩准备金的存在意义以及资本市场的扩张,认为过度的金融缓和政策导致过剩货币资本与通货紧缩并存,从而驳斥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观点。

面对日本国内经济社会的种种弊病,众多经济学者都已经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历史局限性,并纷纷提出替代性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工具。作为注重现实分析、强调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相结合的学派,当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也提出了解决之道和应对之策。针对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劳动力外流等问题,米田贡建议由出口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依据各地的优势资源条件培育本土产业(张杨,2023)。事实上,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循环经济理念,并从政府层

面提供法律保障、资金投入和财税支持，从技术层面构建完整的循环技术体系，从社会层面提高公众参与意识（李赶顺，2002；唐敦挚，2004）。不过彼时的施策重点在于“循环”二字，强调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而米田贡的建议更侧重于“区域”之间的协调合作，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优化区域经济系统的比例和结构，以提振地方经济，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更具革命性的一派学者则将看待问题的视角从经济层面拓展到了超经济层面，从长期经济停滞的表象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例如大谷禎之介等人在《展望未来社会——复苏的马克思》（『未来社会を展望する——甦るマルクス』）中认为，日本社会的未来发展应当朝“联合体”（association）方向迈进，实现社会化劳动和共同生产、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结合，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危机（基礎經濟科学研究所，2010）。具体到经济生产而言，小松善雄（2012）以日本株式会社南精密制作所为案例，主张建立工人持股制的合作社企业。他指出，合作社企业由全体劳动者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确保员工普遍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得到全面的能力发展，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充分结合，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综上所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继承了前辈们关注经济现实的优良传统，围绕着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问题，分析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私有化、自由化主张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提倡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探索社会制度向联合体方向的改革。但受到政治立场等因素的影响，相关讨论多局限于学术界内部，并未如二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建议一般受到重视，也并未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经济政策实践上的表现和二战后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学者何以能够在二战后经济复苏时期发挥积极作用，而在之后却不能，本文尝试运用“结构-能动性”（structure-agency）的解释框架予以回应。结构往往指制度、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等宏观因素，能动性则指的是主体在面临外部冲击后的行为反应（Bristow and Healy, 2014）。“结构-能动性”框架认为，结构可以支撑或阻碍能动性，而能动性则反作用于结构（Giddens, 1984）。

从结构层面看，二战后，由于日本共产党地位的恢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相对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种结构支撑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使在战争时期受到压迫的马克思主义者得以回归学术，并在政府部门任

职。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新自由主义的转向。这种结构极大地阻碍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例如日本政府受此影响开始缩减马克思主义方向的科研经费和教师编制，使得后继人才短缺，难以产生足以影响经济改革的声量。目前，学界对于这些结构性因素已经予以广泛的讨论。但除此之外，能动性也是理解这一政策实践转向的重要方面，只是目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结构化理论中，能动性既依附于特定社会结构，又反过来对其起到构建作用。能动性分为维持型能动性（maintenance agency）和改变型能动性（change agency），前者在受到危机冲击后主张采取措施恢复到原本的发展路径，后者则推动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Kurikka and Grillitsch, 2021: 147—172）。二战后，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组织的吉田内阁邀请各专业的教授和学者参与政策制定、担任政府顾问，其中不乏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专业的学者。这些学者面临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困境，充分发挥改变型能动性，开启了以“倾斜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系列改革，使得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呈现一定的政府主导型和计划经济特征。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后，政府主体发挥维持型能动性占据了上风，面临后续的几次经济危机冲击，政府往往选择通过渐进式、改良式的政策工具来应对，继续维持原有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更具革命性的政策主张则被边缘化。

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一）推进方法论和理论创新，提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再到复兴的阶段。20 世纪 60—70 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在国际上颇负盛名。以置盐信雄和森岛通夫为代表的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学者实现了重大研究方法创新和理论成果创新，使用数学语言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转形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予以回应，并将相关成果在英文刊物上发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话，从而提升了数理马克思主义学派乃至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际知名度。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逐渐陷入低谷：相关学者

在国内的声量减弱，尽管其关于“失去的二十年”的学术研究富有洞见，但并未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复往昔。因此，必须直面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严峻问题，以理论创新为学科流派发展的动力源泉，使其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方法论和理论创新。要继承学界在马恩经典著作研读、文本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以中国经验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发展理论”的互动导向，立足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特点，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问题的有机结合。要积极推进数理工具、量化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融合创新，以逻辑严谨、具有普遍性的数学语言与主流经济学对话，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度，不断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

第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交流机制。要学习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发展动向，重点关注方法论和理论创新。要积极推广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学科的国际传播声量。要深化与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团体的双向合作，通过组织和参与学术会议、互派访问学者等方式，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学同行交流，共同促进学科繁荣发展。

（二）结合实证与规范分析，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施政方向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素有实证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传统。实证经济学旨在描述经济运行的客观事实及其背后的规律，而规范经济学主要论述社会应该建立和实行何种经济体制。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积极参与政，促进了战后经济复苏和高速发展。当前的日本学者继承了前辈的规范分析传统，从经济现实出发，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政策导向和价值取向，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渗透到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应用学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程恩富，2004）。但是，一方面受到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政策建议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主体发挥维持型能动性，在危机后回归既有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马

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未受到政府重视，也无法转化为施政方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认识世界，落脚点则是改造世界。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策实践上的瓶颈警示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强国建设。

第一，关注重大现实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前提下，推进其与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金融学等应用经济学的学科交叉，关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多样化具体实践。要立足中国国情，直面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充分等挑战，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的运用，为认识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系统化理论支撑。

第二，加强学术成果转化，为党和国家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地测度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识别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要坚持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增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打造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之外的增量政策工具包，成为党的建设和政府决策的顾问团队和国家智库。

（三）营造学习和研究氛围，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

在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冲击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盛转衰，尽管目前仍有伊藤诚等学术权威坚守理论阵地，但学科本身在国际上的整体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日本国内也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隐患。一方面，蜚声国际的知名学者相继退休、辞世；另一方面，受到学术大环境的限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求职和任教空间被压缩，相关方向的研究生数量减少（谭晓军，2011）。卓越的学科带头人和充足的人才储备是继承、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要条件，而学科的学习、科研和就职前景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后续梯队的培养，需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困境为鉴，重视人才团队培养和学术氛围营造。

第一，打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深学者和学科带头人。要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领军作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利用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优势，规划学科发展。要充分发挥资深学者的模范带头作用，指导年轻学者在科研上迅速成长，培养一支结构合理、方向明确的高素质学科队伍。要以学术权威为核心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加强不同高校、科研机构和学会之间的交流，打造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平台。

第二，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青年学者和学科接班人。要重视学术研究型人才的储备，招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青年学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发展壮大。要重视高校教学型人才的培养，鼓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进入高校任职，提供学术平台、科研资源和经费等激励青年教师，在教学中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接班人。

第三，营造马克思主义学习氛围，加强对高校学生的价值塑造和知识传授。要完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课程体系建设，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有机结合，传递正确价值观，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待现实问题。要结合学术理论创新成果提升教学质量，确保学生清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逐步扭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被边缘化的现状。要营造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良好氛围，培养高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

参考文献：

-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1962，《日本经济学家宫川实在京谈日本研究〈资本论〉的情况》，《经济学动态》第18期。
- 白川方明，2021，《动荡时代：白川方明亲历日本经济繁荣与衰退的39年》，裴桂芬、尹凤宝译，中信出版集团。
- 陈伟凯、冯志轩、高晨曦、李帮喜，2019，《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2018）》，《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期。
- 程思富，2004，《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实问题研究态势》，《经济经纬》第4期。
- 池田信夫，2022，《失去的二十年》，胡文静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 都留重人，2020，《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李雯雯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 渡边雅男、谭晓军，2016，《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眼中的全球危机》，《政治经济学评

- 论》第4期。
- 冯志轩、陈伟凯、李帮喜，2018，《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017）》，《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期。
- 高晨曦，2019，《柴垣·渡边论争——围绕现代资本主义诸问题的论战》，《政治经济学季刊》第1期。
- 河上肇，1963，《河上肇自传》（上），储元熹译，商务印书馆。
- 江永基，2010，《日本学者对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经济学动态》第2期。
- 李帮喜、王生升、裴宏，2016，《置盐定理与利润率趋向下行规律：数理结构、争论与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李赶顺，2002，《浅析日本“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其方策》，《日本学刊》第6期。
- 李公绰，1986，《近藤康男》，《世界经济》第4期。
- 梁颖、陈佳鹏，2013，《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人口学刊》第4期。
- 刘迪瑞，2016，《民营化：日本临调型改革的最大成果——以国铁公社的改革为例》，《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骆楨，2010，《对“置盐定理”的批判性考察》，《经济学动态》第6期。
- 骆楨，2017，《论置盐定理与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的区别与互补》，《财经科学》第11期。
- 吕守军，2010，《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以“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为线索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
- 乔洪武、陶芸，2016，《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
- 商紫君，2021，《马克思〈资本论〉在日本的传播历程研究》，《国外理论动态》第4期。
- 谭晓军，2011，《研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
- 谭晓军，2014，《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困境及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2014卷第3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 唐敦挚，2004，《日本循环经济及其启示与借鉴》，《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第5期。
- 王生升、李帮喜、顾珊，2019，《价值决定向价值实现的蜕化：置盐定理的逻辑推理困境》，《世界经济》第6期。
- 王新生，2019，《有泽广己经济思想及其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影响——兼谈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对赶超型现代化国家的利与弊》，《日本文论》第1期。
- 王焱侠，2010，《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经验教训及启示》，《日本研究》第1期。
- 闫坤、汪川，2022，《“失去”的日本经济：事实、原因及启示》，《日本学刊》第5期。
- 阎瑞雪，2021，《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日本研究》第4期。
- 杨立国、田晓萌，2022，《日本百年〈资本论〉研究：历程与成就》，《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

题》第1期。

野口悠纪雄, 2022, 《失去的三十年: 平成日本经济史》, 郭超敏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伊藤诚、丁晓钦, 200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日本新自由主义》,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第3期。

余飞、黄瑞玲, 2018, 《日本真的“失去了二十年”吗?》, 《河北地质大学学报》第2期。

张季风, 2013, 《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学刊》第6期。

张季风, 2018,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析战后日本经济周期波动》, 《日本学刊》第2期。

张杨, 2023,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失去的30年”的反思》, 《当代经济研究》第1期。

张忠任, 2005,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轨迹》, 《红旗文稿》第13期。

朱绍文, 1981, 《都留重人》, 《经济学动态》第2期。

柴垣和夫, 2014, 「グローバル資本主義と経済政策——景気対策に焦点を置いて」『季刊経済理論』第3号。

伊藤誠, 2017, 『資本主義の限界とオルタナティブ』岩波書店。

基礎経済科学研究所編, 2010, 『未来社会を展望する——甦るマルクス』大月書店。

高田太久吉編著, 2013, 『現代資本主義とマルクス経済学: 経済学は有効性をとりもどせるか』新日本出版社。

小松善雄, 2012, 「マルクスの協同社会主義像——21世紀における社会主義の復権と新生によせて」『経済理論』第3号。

松本朗, 2017, 「日本銀行の非伝統的金融政策の変遷と経済理論——マルクス経済学によるアプローチ」『立命館経済学』第6号。

太田仁樹, 2012, 「マルクス経済学における経済発展段階と政策——マルクス, ヒルファディング, レーニン, 宇野弘蔵」『経済学論集』第4号。

Bristow, Gillian, and Adrian Healy. 2014. “Regional Resilience: An Agency Perspective.” *Regional Studies* 48 (5): 923–935.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Kurikka, Heli, and Markus Grillitsch. 2021. “Resilience in the Periphery: What an Agency Perspective Can Bring to the Table.” In *Economic Resilience in Regions and Organisations*, edited by Rüdiger Wink, pp. 147–172. Wiesbaden: Springer.

Okishio, N. 1961. “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Rate of Profit.”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7): 85–99.

Shibata, K. 1934. “On the Law of Decline in the Rate of Profit.”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1): 61–75.

Japanese Marxist Economics: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Implications

Li Bangxi^a and Jiang Lirong^b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ab})

Abstract: As a major economy and a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Marxist research in Japan.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Japanese Marxist economics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stage from germination, prosperity, depression to revival, and a number of well-known scholars have emerged continuously. Among them, the Mathematical Marxist School of Economics, as the representative school of Japanese Marxist Economics, has rich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an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fter World War II, relevant scholars applied their research results to the practice of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d the recovery and rapid growth of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based on the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scholars have critically assessed and reflected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two lost decades” under the neoliberal reforms in Japan, and have proposed measures to reboot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 achievements and dilemma of Japanese Marxist economics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olicy practice have dual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Japanese Marxist Economics, Mathematical Marxist School of Economics, “Two Lost Decades”

JEL Classification: B24, B51, O10

(责任编辑：倪诗妆)